

汉译经典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STUDIES IN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德国〕卡尔·曼海姆 著 张旅平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德国〕卡尔·曼海姆 著
张旅平 译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 (德) 曼海姆著；
张旅平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studies in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ISBN 978-7-5447-5000-4

I. ①重… II. ①曼… ②张…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现代
IV. ①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8569号

书 名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作 者 [德国] 卡尔·曼海姆

译 者 张旅平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00-4

定 价 57.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鸣谢

本书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一直处于写作之中，因此，其中某些部分曾以种种形式发表过：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作为《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A.W.Sijthoff's Uitgeversmaatschappij 新版本，莱顿，1935年)一书以德文节本形式出版。某些章节的初稿或作为讲演稿或作为文章也用英文发表过。第一部分作为在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的《霍布豪斯纪念演讲》^①以其现在的标题于1934年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讲演稿出版。第二部分草稿在《社会学评论》第26卷第2号(伦敦，1934年)上发表。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与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发表的演讲一致，并作为C.A.W. 曼宁编辑的《和平变迁：一个国际问题》(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7年)一书的一章出版。第五部分的概要在R.B. 卡特、J. 科恩和R.M.W. 特拉沃斯编辑的《人类事务》(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7年)一书中以“社会建构的目前趋势”为题发表。我要对《霍布豪斯纪念演讲》的董事、《社会学评论》编委会，以及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些部分的出版者A.W. 西吉托夫和麦克米伦公司表示感谢。

根据诸部分的出版时间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许还是值得的，因为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德文本，在我们目前社会的最初阶段便预测到了该社会的某些最新趋势。尽管这种预测在当时似乎是相当

^① 霍布豪斯(L.T.Hobhouse, 1864—1929)系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曾先后长期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任教，主张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统一，著有《认识论》、《发展和目的》、《社会学原理》。——译注

令人迷惑的，但自那时以来，不仅事变已经沿着该书所表明的方向演进，而且被该书诊断为有前途之新趋势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似乎也在增加其正当性。这对我们正在讨论的社会科学之预测是否完全成为可能的时期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尽管某些假设的这种明显确证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探索理解我们社会目前某些变化之路的作者来说，却是鼓舞人心的。

相当于本书一半以上的新内容，正如导言所指出的那样，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最新发展。

没有我的朋友和学生的热诚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在德文版本中，我已对在本人基本兴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我的妻子，以及提供类似的背景和经验、在讨论中有助于澄清许多问题的 A. 勒维表示了谢意。在本书的英文版本中，我必须首先感谢 E. 席尔斯（芝加哥大学），他不仅备好了那些与德文版本相符的章节的译文，而且还以某些同类的项目补充了我收集多年的文献目录。他的颇有价值的理解和广博的知识不仅意味着敏感性，而且还意味着新的激励。我把许多激励性建议归功于 H. 格斯博士。虽然新的部分最初是以英文写作的，但是，如果没有与文学学士 J. 特蕾西小姐（牛津）、经济学学士 J. 弗劳德夫人（伦敦）、文学学士 H. 西特小姐（芝加哥）就几乎所有的项目进行彻底的讨论的话，以一种新的语言或多或少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大概是不可能的。对于文学学士 O. 迪克先生（伦敦）和 G. 帕尔先生在阅读手稿上的帮助，我必须向他们致谢。A. 施瓦茨斯蔡尔德先生一直给予我热诚的协助，尤其在准备索引和核对文献目录出处方面，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导言 社会重建时代的意义

1 从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观点看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危机

对导致民主崩溃的社会过程进行更为彻底分析的必要性。计划与自由能和谐共存吗？

本书的德文版本是献给“我的德国老师和学生”的。因此，它最初是献给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改革时代巨大变迁的人。如果本书以英文出版，其功能便自动改变。它不再是一种为那些实际有着这些经验的人的利益所做的自我启蒙的尝试，而是试图对关于这些变迁仅有道听途说的知识，并对传统稳定性仍抱有极大幻想的世界说明这些经历过变迁的人的观点。

我们不应当试图轻视或隐瞒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事实之中，即尽管那些生活在危险区的人经历了这种作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结构变迁的转变，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崩溃以及极权主义体制的采纳，似乎是仅限于几个国家一时的危机征兆。

对于那些免于这些动乱的人来说，认为世界仍在遭受战争结果的损害，是个令人安心的消息。他们认为专政在历史过程中往往是作为紧急状态中的暂时解决方法而建立的，并乐于以此种想法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对危机有着直接了解的人，即使是专政的强烈反对者，也一致认为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如果

这是一种邪恶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迟早必定蔓延开来的邪恶。此外，他们还确信我们不应当让自己为这一瞬间的间歇所愚弄，而应当利用其获得新技术，没有这种新技术，应付新的局面是不可能的。经验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它不但渲染了对孤立事实的解释，而且还歪曲了从整体上对地位的诊断。凡是人和社会问题受关注的地方，在不同的国家和群体之间就应当有不断的思想交流。用虚假的假设麻醉自己或歪曲事件的意义，以便适合与其说是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国内盛行的情绪所证明的参照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在此，过度的悲观主义与过度的乐观主义可能恰巧是同样危险的。那些被命运赋予机会在许多不同国家生活并与种种观点认同的人的任务，总是会以下述方式思考或自我解决不同态度间的这种冲突：或是与不同意见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或是以新的综合调和意见分歧。

作者学会既以德国人的观点又以英国人的观点思考这种事情，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益处。就其目前形式而言，本书首先受作者在德国的经验影响，尔后又受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并且是调和这两者的尝试。

对于本书来说，“书有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俗话，可能确实是适用的。当本书各章完成的时候，其作者完全处在自由民主社会的解体趋向所产生的经验影响之中。他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到了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民主机构的失败方面；他目睹了其对解决现代大众社会问题的软弱无能。他看到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无计划性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怎样转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曾保持了社会进程均衡的“自由放任”原则，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是如何导致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混乱。

由于这些经验，他体会到旧意义上的“自由放任”将不再起作用；而在工业社会的现阶段，不论形式如何，计划都不可避免。如果这

种计划不想粗暴地对待社会自发力量的话，他不完全清楚它应该采取何种形式。那时，他并不奢望从对自由民主国家的研究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不愿意分享盛行于中欧的看法，即民主制已经走完了其通常的历程。

这种怀疑论的看法并不与作者个人倾向相一致。本书甚至在那时也是从把自由和个人的责任看做是一切价值之最的人的观点来写作的。但是，他，以及类似于他的人，都渴望防止自欺欺人。对于他说，对在自由民主危机中发生的一切进行唯实论的描述和理论分析，似乎比仅仅以意识形态上断言自由和自决的功罪更为重要。

对于这种失败的具体分析——作者认为——至少要注意祸害的原因。社会有机体不可能靠纯粹的热情获得康复，而只能通过对病灶的认真研究来治愈。

在这种意义上讲，本书的德文版本本身是完满的，它代表了作者试图解释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阶段。与德文版本相比，英文版本几乎是一部新作。这不仅因为它包含了新的篇章，而且还因为原有部分也根据实际材料重新加以证明和进一步精心写作。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视野上的差别是，作者最近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几乎未受干扰地发挥功能的国家。这给予了他就近研究其原则之效能的机会。虽然这有助于他扩大其经验框架，使自己免除对我们时代民主生命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但是新的环境中，他遇到了某些他不愿以一个纯粹探究者的精神面对的事实。由于这个国家的暂时的安全，他总想对这样一种乐观主义让步：该乐观主义能使他忘却我们全都正坐在火山口上，忘却实际经历过爆发的那些人对于正在我们西方社会底下裂开的火山口的性质和深度有更多的了解。

2 作为现代社会失调主要原因的自由放任原则和无计划调节原则间的冲突

本书的目的——就人格的塑造和社会的组织范围来研究这些失调。没有人格的转变，社会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

作者感到，记住我们社会面临的并非暂时的不安稳，而系结构的根本变迁，是重要的，因为这一体会是预防措施的唯一保障。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处于危机地带的西方社会为什么正在经历一个解体阶段时，才会有这样的希望：仍在享受比较和平的国家将学会通过民主计划控制事变的未来趋向，从而避开这一进程的消极方面，即专政、顺从和野蛮状态。对于作者来说，这似乎是，在从多种视角研究问题和权衡有关近 10 年变迁的种种解释之后，我们必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目前这一时期，计划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自然希望它将采取的形式与专政所体现的形式完全不同。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并不要求牺牲我们的真正自由或民主自决的思想。

一个十足的唯实论者，自然会看出计划可能易于腐化为专政和对所有的自由的压制。但是，正是这种唯实论的态度阻止作者立即拒绝计划的思想。有关社会结构和现代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的精确分析——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没有给我们留下其他抉择。因此，同意本书的诊断，有赖于读者是否将承认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已经完全转变。如果给定这一假设，那么便不再存在计划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任何选择，而只有好坏计划之分。作者本人宁愿生活在一个社会秩序和控制技术不允许一伙人把其“美好生活”的构想强加给其他人的时代。但是，我们无权选择社会秩序及其控制技术。它们已经存在，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就是朝着最有

利的状况组合和塑造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是否存在任何本质上保证不被专横滥用的计划形式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每种区分了计划中的有价值的现代要素与倒行逆施的专政构想的研究，都超出了理论的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直至目前为止，历史尚未产生真正的计划尝试，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诸实验都是与东方专制主义精神或军事独裁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对于现存极权主义国家的素朴的研究和描述是相当不充分的，只有根据近 10 年的具体经验对事实进行理论分析，才能辨别真伪。

唯实论不允许一个人预言乌托邦式的未来。必须十分严肃地说，机会仅仅只有一次，具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应及时地把握方位，并非常热情地使其古代遗产恢复生机，以便应付新形势。但是，今天这种复兴不可能只是一个情绪问题。新的政策还必须伴有理论阐释的过程，以便发现某种将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决存在的计划形式。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成功的社会组织不可能获得机会。在“终于对付过去”的精神下，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不可能成功地受到影响，或者甚至被转向。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大，以及对民主文明的威胁愈来愈明显，不存在为何不应当转变我们的思维习惯的理由。

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引导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该仍旧专注于不断地追求眼前的利益。新形式的政策只能在更高的觉悟，即热衷于实验的觉悟程度上获得成功。

如果我们想要控制我们在这一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境，而不是让其控制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尽一切我们可资利用的科学能量来研究民主体制危机和遭难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必须力图毫无偏见地理解独裁国家中的心理变化和制度性组织的发展，是对同样的基本情境——工业时代晚期已成为普遍的情境——的不同方式的反应。

在这些环境中，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充满“你的事业正在进行”这样的情感，虽然不是在我们应当模仿独裁的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讲。相反，我们必须致力于其研究，以便当类似的危机在我们中间发生时，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西方民主传统精神的方式应付它们。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往往只是解决这些国家突然面临的具体困难的慌乱尝试。甚至在私生活上，个人也爱寻衅地反应，一旦他不受从理论和实践的情境控制，便力图对别人的自由横加限制。精神枷锁常常是由愚昧无能和无知的恐惧造成的。因此，既懂得自由民主社会的困境及其在危机时期的失败，又研究被称之为专政的强制解决方法是重要的。

这是使独裁要素与计划分离变得有望的唯一方式。或许在政治史的下一个阶段中，人们能够发现将使自由与计划两原则统一起来，以便一方面避开在无计划的社会进程中必定产生的混乱，另一方面又确保权力和极权主义的扩张本身将不被看做为目的这样一种社会机制。这只能通过思想、实验和政治活动来获得。一个人愈是习惯于把政治问题既部分地看做是权力问题，又部分地当做成功或不成功的社会组织问题，便似乎愈少带有乌托邦色彩——不仅会强调前一方面，而且也会重视后一方面。这使得运用我们的全部智能去发现这样一种结合的社会控制变得十分重要：它将确定个人自由应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限制，以便既保护个人自由，又维持共同体的效率。

本书所采纳的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而辩护的方法，不同于通常的方法，因为它并不把这一问题仅仅看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具体的社会学分析，解释什么样的自由、民主和文化才能在已改变的社会系统中存在。通常对于自由、民主和文化的辩护可能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讨论一般以指出自由本身优于严密管辖，自决优于独裁，以及自发的文化优于自我表现的审查制而告

终。只要问题以抽象的形式出现，任何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种胜利似乎来之太易。我们今天并不关心任何抽象形式的自由是否比任何抽象形式的严密管辖更好。问题宁愿是要发现各国中的什么样的结构变迁导致了盛行于 19 世纪的自由、文化和民主类型的衰落。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灾难情境不可能仅仅通过下述方法来诊断：重复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学相关的古典的自由辩论，以及应用仅在社会发展的前一阶段和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才有效的分析，更不必说医治了。

显然，只要自由和民主仅仅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或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这些紧迫的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只有当我们能够像自然科学家调查一个动物物种，并依据该物种所能生存的唯一环境来研究它那样，从社会学上分析这些问题时，我们才真正开始设法解决它们。同样，政治组织原则的适当性，只有通过经验方法，亦即通过认识那种或允许机制在社会中发挥功能或消除这一机制的社会过程，才能被发现。

但是，仅仅依赖对社会的经验分析还不够。经验主义只有在为适合新问题和扩大的经验而构造理论时才回答理论问题。除非我们愿意修正有关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解释和达到新的思维水平，否则，曾经势不两立的自由与计划的概念是否并非确实不可调和这一假定的问题，便不能得到答复。恰恰因为盲目调节与周密计划都干预事物的假定的自然秩序而没能清晰地区分这两者的人，将永远不能理解审慎计划的社会与垄断集团自私的花招之间的区别。仍旧使用作为反对绝对主义官僚制的防御物来使用术语的人，永远不会懂得在今天计划为什么应当意味着某些不同于在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时代官僚机构干预所意味的东西。如果计划一词包括每一种调节，而又没有区分任意干预与协调控制的话，它便太过于含混，以致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线索：为什么恰巧在这一代中计划开始具有了真

正的意义。

一个人可以通过以下事例表明所有的政治思维都会特别依据特殊的时代背景自动地系统阐述其基本术语。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将总是揭示出一种把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精神体验的诸特征看做是绝对的，因而以一般的思想定义来概括它们的无意识倾向。

例如，就自由而言，19 世纪不可避免地意指那些在其自己的社会秩序中已成为可能和习惯的自由形式。随着这种秩序的改变，新的情境便产生了，于是，越发明显的是：旧的界说是建立在范围过于狭窄的实例之上的，这些基本术语不得不作修改，以包括新的经验材料和更为广泛的问题。^① 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每个新时代要从重新界定其术语开始的理由。国家、主权、权威、财富、法律，等等，在历史进程中总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但是，易于采纳更为广泛意义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观念。所有的观念都必须描述为历史性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植根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中，并随着人性概念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和心理的变化而改变。假定这些历史性术语因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理学的思想不如自然科学的思想更为科学才改变的，将是错误的。每一个时代都重新界说这些术语，因为在历史性的科学中，新的经验材料只有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才能获得。诸自然科学总是重新界说其术语，以便与知识的增长步调一致。新的事实一迫使其修改有关现象的流行的符号表示，它们便扩充其定义。尽管自然科学家能够在任何时候扩大那种新的经验事实的范围以包含愈来愈多的数据，但社会学家却往往不得不等到新环境中事实借以出现的新社会秩序的出现。在历史性的科学中，社会秩序的变异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呈现出来，而且，只有变迁着的社会情境才显

① 参阅第六部分：“计划水平的自由”。

示出这种变异的范围有多宽。

社会的解组和重建仍然远未得到推进的国家，将首先反对这种对所熟悉的术语——如自由与计划——进行重新解释。其尚未能认识到以前的事态只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形式，旧的思维习惯为其概念的构成所囿，亦即只能用以解释其自己时代的基本关系。但是，尽管存在这种反对，我们仍必须强调这一事实：直到我们认识到转变过程包括思维本身之后，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才能被领会。

出于这一理由，在对我们社会的基本变迁给予经验分析的同时，人们正尝试着考虑思维本身以及把现在冲突着的思维方式解释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种社会学的解释会有助于表明为什么现代的问题不能在以前问题的框架内，或通过旧的思想资质加以解决。

如果某人以危机感萦身的观察者之观点看待西方世界变迁，显然这些变迁并非由一系列不快之事和孤立的骚乱所构成，而是由一种旧社会秩序的缓慢的或有时迅速的解体，亦即重建的最初踪迹在其中已经可见的解体构成的。我们今天知道，把历史过程看做是从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戏剧性转变的倾向和谈及彻底的重建的倾向，反映了革命团体的情绪，并无意识地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少数惊人的事件上。这将会忽略以下事实：甚至在所谓革命的时期，新旧事物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仍旧是在这样的时期，在往往被忽略的社会调适过程中也可发现决定性的变迁。革命的火焰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这种不断变迁中，只照亮了几个较惹人注目的阶段。没有静静的准备，革命的热情不可能使改革普遍推广蔓延开来，出于这一理由，如果革命者做得过火，政令变化过多，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反动便接踵而至，或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各种在整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新制度融于旧制度之中。形象地讲，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

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

这种只是很少强调魅力和事变以及按照过渡而非绝对对立来思考的、对社会过程的研究，不该忽视这一事实：甚至在种种琐碎的微观过程中也往往能够发现全新的建构原则，假如以某种方式得到整合的话。因此，主要原则并非不常常潜隐于细枝末节的面具背后。如果注意力不是放在进化与革命的对比上，而是集中于变迁本身的内容，显然，今天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则全都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它们正在遭受其正常生存方式的同样的脱节(dislocation)之苦，某些国家显示出明显的危机征兆，而另一些国家则在社会太平的幌子下，以更为缓慢的速度正经历类似的变迁。这一事实仅仅是由于对各国的压力分配不均衡，以及某些国家存在着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所致。

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言未来社会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得知，甚至当代情境中全新的东西通常也只是后来现实中的一种因素，因为历史总是有多种力量在发生作用，这些力量比寻找单一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改革者所愿承认的要多。尤其是最近几年教育了我们：甚至革命的体制也已放弃了许多原初的框架，而明显太平的国家则不情愿地迫使自己调整愈来愈适应于相反的体制。在社会太平的假象下，这些国家至少已变为半极权主义的，而另一方面，极权主义国家却已经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有的计划。由于民主制中的调节和国家干预、俄国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变更，以及德国若干重要经济领域中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悄悄排斥，这些国家中许多含有相当不同观点的倾向开始趋同。所有这些致使我们猜测：虽然出现在工业时代晚期，但只有现代社会的转变才使之显露出来的深层力量，迟早会迸发出来。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旧的自由放任和新的调节原则被允许不加控制地并存时，紧张和困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领域，这种对抗的结果可见

于这样的事实：每个国家的生产在逻辑上正朝着国际经济交换方向发展，而不是接受我们通过巧妙的保护手段创造的民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技术进步与现代货币和信贷经济共同显示出增进共同利益的种种希望，然而，由于危机，大众正在逐步贫困化，增加的生产面临着日趋缩小的市场。我们正在集中国家主权的权力和资源，摧毁最后的自治残余，也就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最后的反抗机会。但是，这种把社会整合成空前庞大的单位的过程，正在为由军事技术的最新设计而强化的、大大小小的专制国家的这样一些绝对主权要求所抵消，它们并非在为世界的秩序尽力，而是正在为世界的毁灭效劳。

甚至就这些国家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不仅在专政下而且在民主制中也发现了正在起作用的敌对社会力量。在后者中，调节内部组织的种种倾向处于相争状态，而没有什么公众认清事实或看出任何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政治家和理论家仍在按照自由主义来思考，尽管为有计划的国家铺平道路的制度和政令的数量与日俱增。由于使人们的原则与其现实行动之间出现鸿沟的意识上的分裂，这些政令和调节正在隐蔽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绝不会减少其重要性；相反，它们越发造成危害，因为没有人停下来思考后果。于是，它们处处与更自由的体制相抵触，使其运行陷于瘫痪。

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国家，有助于更具弹性的因素正在奋力地表现出来。因具有调节癖而把计划看成是一种国家的拘束衣的专政，并不能够压制批评和自我改革的冲动。其体制像一个濒于爆炸的汽壶，由于没有提供制度作为安全阀来起作用，因此始终存在着它可能爆炸的危险。以清洗取代明智的重建是非常不适当的。所有这些征兆都证明，每个国家都在探索组织工业社会的新方式。民主尚未发现一个公式以确定社会过程的哪些方面能够用调节加以控制，而专政又不可能看出干预每件事情并非计划。因为计划只有当

它基于社会中的创造性趋向之时，亦即当它控制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又没有压制活力的时候，才能具有积极的价值。

某些过程既在国内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它们只有在新的计划形式中才能找到归宿。只要诸社会力量自行其是，冲突便恰巧在它们即将获得解决办法之时爆发。但是，人们在最后时刻还未把这些潜在的趋向变为切实可行的体制，正是由于人的不适当，而非仅仅由于社会力量本身。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让外在的趋势各行其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能够看出正确的要做之事的新型人，以及将做此事的新的政治集团。

尽管迄今为止，主要的历史变迁对于个人和局部性群体来说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社会的进化现在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就行动者而言，没有充分的洞见，这些过程是不能得到调节的。此外，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承担过创造社会整合的职责——因为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种种冲突着的倾向任意妥协的结果——但是今天却存在着这样一种迹象：如果从事政治的集团仍然不愿超越自己的眼前利益来看待事物，那么社会便将遭遇噩运。在目前的事变阶段，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先见之明，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又是同在许多方面与以往已通行的心理学、伦理学和行动计划完全不同的心理学、伦理学和行动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只有通过人本身的改造，社会重建才成为可能。人的目的的重新解释、人的能力的转变，以及我们的道德准则的重建，并非是一个开导性说教的问题或空幻的乌托邦。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理智地做什么。

3 对往往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心理学的需要

对与纯经济过程相对的社会学过程本身及其对文化影响的研究